



勇攀科学高峰

——吕叔湘、丁声树等著名学者的故事

YONG PAN KEXUE GAOFENG

勇攀科学高峰

——吕叔湘、丁声树等著名学者的故事

林玉树 著

YUWEN CHUBANSHE

语文出版社

YONG PAN KE XUE GAO FENG

勇攀科学高峰

——吕叔湘、丁声树等著名学者的故事

林玉树 著

*

YUWEN CHUBANSHE CHUBAN

语文出版社出版

北京朝阳门南小街51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通县向阳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/32 3 3/8印张 70千字

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-4,000 定价：0.80元

ISBN7-80006-100-0/H·0

目 录

吕叔湘的故事

- 扶植后学 尽心竭力…………… (1)
- 一台录音机和一个新领域…………… (4)
- 相知何必曾相识…………… (7)
- 贵在“认真”…………… (9)
- 务实与求新…………… (12)
- 辛勤劳动一辈子的知识分子…………… (16)

丁声树的故事

- 绒衣送暖…………… (19)
- 三访琉璃厂…………… (21)

“生命从80岁开始”

- 访著名作家冰心…………… (23)

铁肩担正义…………… (29)

春风春雨…………… (35)

三访卢嘉锡…………… (40)

他是一棵大树

- 记华罗庚教授…………… (47)

数学家王元成功的秘诀…………… (52)

访回国后的陈景润同志	(57)
陈景润会见小学生	(61)
张广厚和他的妻子	(63)
闪亮的心	
——关于科学家心灵美的通信	(68)
中年化学家卢佩章	(76)
童 鱼	
——记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教授	(79)
探索热带病的秘密	(84)
他心中的天平	
——记著名神经外科专家王忠诚	(92)
药用植物学家肖培根与他的事业	(98)

吕叔湘的故事

扶植后学 尽心竭力

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是我国语言学界的领袖人物之一。他扶植后学的饱满热情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，务实与严谨的学风，孜孜不倦的开拓精神等等，集中地反映了老一辈科学家的思想风貌和高贵品质，为中青年知识分子树立了学习的榜样。

在语言学界的中年骨干之中，有的人曾经听过吕叔湘的课，有的人曾经做过吕叔湘的助手，许多人曾和吕叔湘共事。他们的共同感受是吕叔湘乐于尽心竭力扶植后学。

1960年，语言所来了一位年轻人，给吕叔湘当研究生。见面之后，吕叔湘问他有什么爱好，他答：“喜欢音乐，对语音研究有兴趣。”吕叔湘说：“你可以研究语音与语法的关系。语法由我指导；语音问题，我为你再找两个老师。”第二天，吕叔湘就带这个研究生去见所里的几位语音专家。吕叔湘对大家说：“从今天以后，这个年轻人也要跟你们学语音，也是你们的学生。”

这个研究生在大学里是学俄语的，但达不到应用的程度。吕叔湘告诉他，研究语音学，英语比俄语更有用，“我

来教你英语。”他为年轻人找了一本斯威特的《英语新语法》做教材，每天给年轻人上课。

与此同时，吕叔湘发现所里不少同志有进修英语的要求，就开了一个20多人参加的进修班，选用美国弗里斯的《英语结构》一书做教材，自己授课。在吕老的指导下，进修班里有五位同志还把这本专著翻译出来，交出版社出版。

吕叔湘的一位助手，给我说了这样一件事：

她是60年代后期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专门化的毕业生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考取了吕叔湘的研究生，1981年毕业后被留在语言研究所，给吕先生当助手。

在当研究生的时候，吕老就对她说，他在40年代写过一本《近代汉语指代词》的初稿，将来要请她帮着整理。可是，到她当了助手以后，吕老就不再提这件事了。

不久，吕老找她谈话，给她一篇“些和点”的草稿，要她整理修改成一篇论文。这篇论文刚刚脱稿，吕老又给她出了个题目，要她研究一下《现代汉语疑问语气词呢的来源》。吕老看完第二篇论文以后，又给她出了一道题目，叫她写一篇关于汉语史研究方法的论文，特别提醒要看一些日本学者的文章。为了写这篇论文，这位助手整整花了三个月的时间。看了初稿以后，吕老比较满意，但是不同意拿出来发表。他说：“你是把别人的话概括了一下，自己懂了就行，不一定要发表。”

这时候，吕老才把《近代汉语指代词》的初稿交给她，让她整理。

这位助手说，吕老为了让我整理好他的旧著，花多大精力来训练我！他对我的要求真是很严格啊！

在社会科学院大楼的一个小会议室里，一位现在已在语言研究所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，抱病接待我的采访。他说，吕叔湘对他的教育和影响是多方面的，从学术、思想，乃至为人。

1955年，这位同志从北京大学毕业后，就被分配到语言研究所工作。为了让他多方面了解语言学的各个领域，吕叔湘把他分到《中国语文》杂志当一年编辑。当他后来转入现代汉语研究室之后，吕叔湘发现他对宋元白话的研究有兴趣，就鼓励他在这方面努力，并且帮助他熟悉这方面的材料。这位同志在吕叔湘的指导下，一步一个脚印，脚踏实地地工作。眼看他的研究将获成果，“文革”动乱将资料毁了，使他对科研心灰意懒。

有一天，他去看望吕叔湘，说起这件事。吕叔湘用一件自己熟知的往事说服他。吕叔湘说，当他在南京东南大学上学时，著名生物学家秉志在那里教书。秉志用自己收集的大量生物标本武装生物系，在全国学界享有盛名。不巧那年生物系发生一场大火，秉志的标本被烧光了。眼看自己前半辈子的成果毁于一旦，秉志并没有消沉，相反却更加努力地工作。后来，他再次收集齐全生物标本，并在生物学研究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。吕叔湘说：“人家秉志是这样做学问的。他意志多坚强！而你失去的仅是三年之中收集的资料，怎么能灰心呢？”

这位同志从吕老的话中受到鼓舞，近几年科研成果累累。他编著的《近代汉语读本》已经出版，他的《古代白话文献简述》、《〈大唐三奘取经诗话〉写作时代蠡测》等论文，也在语言学界引起重视。

为了鼓励我国青年语言研究工作者，吕叔湘捐出多年积蓄的六万元，设立青年语言学家奖金（顺便可以一提的是，解放初期，他和朱德熙合写的《语法修辞讲话》，曾多次重版，印数近一百万，按当时的版税办法，收取版税九万余元，他俩全数捐献支援抗美援朝）。奖金设立以来，每年评奖一次，至今已评了两次，有四名青年学者得奖。

一台录音机和一个新领域

1958年，一位年轻人刚进语言所便急于出成果，以施展大学里的抱负。当时，吕叔湘任副所长，分工领导现代汉语研究室，恰巧是他的“顶头上司”。

吕叔湘看到这位年轻人搞研究还没有上路，今天抓这个小题目做一下，明天又换个题目写一篇，很为他着急。一天中午，他特地把年轻人叫进办公室闲聊。吕叔湘说：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功。做学问来不得急于求成！”年轻人脸红了。吕叔湘又接着说：“你勤于思考和动笔，这是好的，但千万不要企图用小本钱做大买卖啊！做学问一定要讲究个‘实’，要占有材料。”

吕叔湘要求他系统而深入地读别人的研究论文，写提要，写札记，做卡片，锻炼做研究工作的基本功。他依着吕叔湘的话，几年中间读了60多篇论文，都写了详细的提要。

“文革”期间，有一次，年轻人在工厂碰到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。几个工人围着他问：“老师，为什么有的人会说不会写，又有的人却会写不会说？你是研究语言学

出，给我们解释一下吧。”年轻人想了半天，答不出来，只好支支吾吾地说：“这个，这个我还没有研究过……”

回家的路上，他考虑再三：这不是口语的研究对象吗？要有部录音机，把别人说的话录下来，再同他写的文章来对比，不就可以摸到规律了吗？啊，所里不是有一台小录音机吗？现在正躺在保险柜里睡大觉呢……他把自行车一转头，奔吕叔湘家去了。

吕叔湘听了他反映的情况后，很感兴趣地说：“语言有两方面：一是书面语，一是口语。眼下前者受重视，后者被忽略。你想做口语的调查研究，很有意义。可用录音机把人们说的各种风格的话录下来，包括受过教育的和没有受过教育的，有准备的和没有准备的。录下来了再把它一个字一个字地整理出来，再跟写的比较。”停了一会儿，又说：“至于录音机嘛，你马上写个借条，我批准照借。”

这位年轻人拿到了录音机，走上了口语研究的道路。他马不停蹄地工作着，在工厂农村里录到一部分讲话，还搞到一部分书面对比材料。他兴高彩烈地去找吕叔湘，把录音带放给吕先生听。

吕叔湘不满意这些录音，他说：“你录的都是政治口号嘛，这不叫口语。你应该录点日常生活的口语，才有意义呢。”

吕叔湘找到一份报纸说：“昨天报上还登了某家母女失散30年喜团圆的事。你要是找到失散的母女，录下他们的对话，再拿来跟报纸上的报道比较，那才有意思哩。”

吕叔湘的几句话，让年轻人开了窍。他下工厂，串街道，访亲友，找线索，跑了北京许多地方，辛辛苦苦地录下

了50多篇口语材料。吕叔湘眼看年轻人的工作有了长进，又把他找去了，说：“你现在可以整理材料了。在这个基础上，你可以写一本书。我已经帮你拟了个提纲，你拿回去再研究一下。”

1978年11月，这位年轻人写成了书稿，吕先生审读了以后，亲自写信，把书稿推荐给一家出版社。第二年，年轻人的第一本著作《说和写》问世，后来一版再版，发行了30多万册。这本书出版不久，吕叔湘又给他写了一封信，恳切地说：“你的第一本书出版，这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是个大事。希望出这本书以后，千万不要骄傲，要看到自己不足的地方。”

正像吕叔湘早就说过的那样，在语言学研究方面，口语研究是不太为人注目的。这位年轻人有一段时间很沉闷，因为他的课题难于列入科研选题。在研究室的一次选题会议上，吕叔湘说：“口语研究很有价值，我们还应该研究一下中小学师生的口语。是不是所里派一个同志到中小学蹲一、两年？”吕叔湘话音刚落，这位年轻人就接上茬，说：“这个选题我有兴趣，我愿意到中小学蹲点，实验口语教学，提高中小学师生的口语水平。”

他连续在中小学蹲了两年，把口语研究的范围和内容扩展、丰富了。这个期间，他写了30多篇论文，发表在各种杂志上。后来，还写成了一本《小学口语教学》和一本长达28万字的专著《汉语口语》。十年之中，在吕叔湘的指导下，他从录音入手研究口语，走面向社会、面向群众、面向应用的研究道路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，总共发表了140万字的著述。

我见到这位过去的年轻人的时候，他已是副研究员了。他说：“是吕先生带我闯进口语研究这个领域。他要我避免飘飘然，意思是叫我不要忘乎所以，仍要扎扎实实地开拓。他的话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！”

相知何必曾相识

吕叔湘从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《语法修辞讲话》起，就不断收到读者来信，其中有讨论语法问题的，不乏很有见解的，他都尽可能解答，并通过这途径结识了一些文字之交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后，吕叔湘主编《中国语文》，也常常在来稿中发现人才。对瑕瑜互见的稿子，他往往提出修改的详细意见。他发现和扶植了许多素昧平生的中青年人才。

我见到北京语言学院一位副教授，她非常感激吕叔湘对自己的指导和培养。她说：“我和吕先生素昧平生，可吕先生扶持我就像对待他的学生一样。”

这位女同志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六届毕业生，在北京育才中学、红旗夜大教过语文。1974年才调到语言学院，专门教外国留学生学中文。

外国留学生不会正确运用可能补语（动词+得/不+补语），引起了她的注意。她在寻找可能补语应用的范围和规律，写了一篇关于可能补语的论文。开始她不敢投给权威杂志，而是交给一个普通学刊，没有被采用。在不得已的情况下，她才把这篇论文投到《中国语文》，希望引起语言学界的重视。

当时，她是无名的。她既不把自己看做千里马，也不敢想象会碰到伯乐。一天，她收到《中国语文》编辑部的一封信，信里说：“你的论文我们准备发表。这篇稿子经吕先生看过，他在统计表方面提了点意见，希望参照修改。”她没料到吕老在百忙中会对她的稿子提意见，大为感动。后来她这篇论文，经过修改以后，终于刊登在《中国语文》杂志上。

1982年下半年，她写出第二篇论文《动词重叠的表达功能及可重叠动词范围》之后，亲自登门送给吕老审阅。

过不了几天，吕叔湘又一次给她的论文写了修改提纲，还附上了一张短信，指出她的毛病，说：

“我觉得你原先标的节次有点乱，给你调整了。又，例句的编号最好全篇一贯到底，便于前后称说。这要在文字段落调整以后才能着手。

你写文章的毛病主要有两点。一是眉目不够疏朗（组织工作薄弱），二是文字欠明净（有些地方字句罗嗦）。希望你在调整段落之后，再从头到尾把文字修改一遍。”

她没有辜负吕叔湘的希望。1983年《中国语文》刊登她的第二篇论文；同年，她被语言学院评定为副教授。

像这样的事，还有不少。河南一位副教授的第一篇论文是吕叔湘帮助修改的；天津的一位副教授的第一篇论文也是他帮着修改的；还有不少别的地方的中年语言学者的论文，都浇铸着他的心血……他审阅过的稿子应以数百万字计算。他不欺无名，扶持后学，真是相知何必曾相识。

有一次，外地一位中学教师给吕叔湘寄来一部《句子结构图解》的书稿，助手认真阅读以后，认为没有什么学术价

值。但是，作者一笔一划认真工作的精神又使她感动，她特意把书稿交给吕先生看看。

几天之后，吕叔湘把助手找来，说：这个教师的研究方向有问题，还可能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。这位教师用很大的力气，花费很多时间画出这两大本图解，是不值得的。句子结构是由一些基本格式构成的，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例子画成图解就足够说明问题了，何必大量重复呢。现在这位同志选了许多许多复杂句子作图解，并且每个句子都分析三遍，花这多时间，太可惜了。不能再让这些同志走弯路了。我已给作者写了一封回信，请你抄一份交给《中学语文教学》杂志发表，我希望更多的同志不要走这种弯路。

吕叔湘的文章发表了。他热心为后辈把正科研方向的精神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。

贵在“认真”

1981年前后，《中国语文》编辑部收到一位年轻同志的论文，是研究孟子语言里的一个问题的。一位副主编认为这篇文章颇有水平，就送给吕老审阅。不几天，吕老把这位同志叫去，说：“你查过加拿大学者杜百胜的书吗？这篇论文的材料和结论，可能在杜的书中都讲过。”这位同志到语言所资料室一查，果然像吕老说的那样。原来这位年轻人做了一个重复研究的工作。

吕叔湘1949年在开明书店当了一年编辑；1978年《中国语文》复刊以后当了主编。1981年他在商务印书馆举办的

“编辑出版业务讲座”上，作了题为《谈谈编辑工作》的报告，认为编辑应当具有三个方面的修养：第一个方面是业务知识；第二个方面就是语文修养；第三是技术问题。至于具体的编辑工作，他认为，应该分五步进行：第一步决定稿子要不要用；第二步，对于有缺点的稿子，提出修改意见；第三是核实，第四堵漏，第五整容，对稿子进行文字加工。吕老说：“作者和编者的关系有两句常说的 话，一句叫做‘文责自负’，一句叫做编者把关。”两者不可偏废。他 特别 强调编辑要把好关。

对于出版工作，吕老也很关心。他曾经对出书难、买书难的问题，写过文章。现在他是国家出版工作委员会委员，还担任语文出版社社长。对于这个出版社的工作，他抓得又细又紧。

1985年秋天的一个上午，语文出版社编辑部一位负责同志和吕叔湘在通电话。吕老在询问一本书稿的终审情况。

“同志，那本书我已经读过了，有些篇质量很差。这本书你是怎么审稿的？”吕叔湘在责问。

过了一小会儿，这位负责人才惊醒过来，忙解释说，这本书稿是自己审的。

“那你是怎么终审签字的？”吕叔湘问。

“我抽审了一些文章，以为没有什么问题，就发稿了。以为那些文章大都是刊物上登过的，我们只是收编而已。”

吕叔湘大声说：“刊物上发过的，我们都能收编吗？有的刊物是很不负责任的，有的发的是关系户文章！”

“我马上把您的批评意见向编辑部同志传达。”

“我是批评你的，不必传达。”

电话挂断了。接电话的负责人心里翻腾了起来：1984年9月，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决定加强语文出版社的工作，让出版社真正发挥作用，请吕叔湘担任出版社社长。吕叔湘考虑再三，总算答应了下来。他已是80多岁的人，许多实际职务都推掉了，只留下这一个职务。他希望出版社多出版一些语文方面的学术著作和其他好书，把语言研究的成果推广开去。他要亲自过问选题，审阅重要书稿。他经常说，我既担任了这个职务，就不能挂个空名。他还说，出版社一定要出好书，不然他就不当社长了。

吕叔湘管出版社首先是把好每年的选题关。1985年初，出版社一位负责人带上全部选题去当面向他汇报。当他读到一部分选题以后，含蓄地笑着问：

“呵，你想赚钱？”

“出版社初办，经费太困难，财政部要我们自负盈亏，我是想赚点钱。”回答是诚恳的。

吕叔湘此时严肃地说：“想赚点当然也是应该的，可不能一味为了赚钱，以至砸了出版社的牌子！不要忘了，招牌更值钱！”他建议删去其中一些选题。

从这件事情发生以后，语文出版社的同志名正言顺地把老社长“缠”上了。凡是棘手的事情，难以决断选用的书稿，经常出现在吕叔湘的桌上，而他处理的办法只有两个字：“认真”！

一位老专家带几个人翻译了一本国外有关语言理论的专著，译稿寄到语文出版社。责任编辑几经阅读拿不定主意：出版吧又怕内容太旧，不出吧又觉得有点儿可惜。他进退维谷，就向吕叔湘请教去了。

吕叔湘审读这本译著以后，明确指出：“把本书介绍给我国读者是有意义的。但是从译本本身看，译者水平参差不齐。应当叫那位老专家重新校过，进一步提高水平。如果他不肯修改，那就只能算了。”

听了吕叔湘的审读意见，责任编辑心中有了底，他把书稿退给作者去修改了。

有一次，出版社编辑部真正犯难了：一位老专家寄来一本讲稿，要求出书。编辑部读了这本书以后，一致认为材料和写法较旧。退稿吧，又碍于老专家的面子。这个不好处理的难题，又提到吕叔湘面前。

吕叔湘审完这本书稿后，要亲自出面给作者写信退稿。然后，他语重心长地说：你们不敢退稿，实际上还是不了解老专家。这些同志在语言学界工作了大半辈子，想出书是很自然的，想为语言学发展做贡献嘛。但是，鸟尚且爱惜羽毛，人焉能不爱惜名声？你只要讲清原因，他们自然会通情达理。何况我们坚持的是对读者和科学负责的原则，我们还担心什么？！

务实与求新

1984年6月1日上午，北京语言学院为纪念《语言教学与研究》杂志创刊五周年，邀请部分在京的语言学家举行座谈。吕叔湘应邀题字，写下“务实”二字。务实，正是他的学风。

翻开吕叔湘的著述年表，我发现，在吕老数以百计的著